

入獄記

楊光政 著



楊光政著

入獄記

太平書局印行

入獄記

著者 楊光政

發行人 陶亢德

發行所 太平書局

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
電話九四九一五

印刷所

上海洛陽路六四九號
中國科學公司
電話七四四八七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初版

每冊定價

120元

序

翻出十餘年前攝的一張小像，在背面有記云：「一九三二年四月十日清晨四時於南京中央大學被捕，拘押於警備司令部看守所凡五十二天，五月二十一日解居江東橋中央軍人監獄，判徒刑十二年，因師友營救，於一九三三年二月八日午後三時由二哥至京具領出獄，九日攝此留念。」到了十三日又攝小像一幀，亦有同記。

我在獄中時，患痢疾甚劇，最重時日便八九十次，幾無生望，乃與某同學（即後文中所說的老洪）同時調居優待室，另有托派中央宣傳部長林超真君亦來同居，共三人。室頗寬大，空氣亦佳，且近軍醫處，請求診治較便。但林君因恐外間誤會（或因不欲與我等同居），不願受優待，不久即遷出，仍住普通監房。我病達二月餘始漸告癒，自購藥品，所費頗多，乃爲某書局譯述童話集，聊藉稿費爲補貼。病癒後會將在看守所時所見聞「誘姦案」始末一段記出，閒時會寫若干詩與散文，多已遺失，保存者無幾。出獄後，某書局老闆會囑撰「獄中記」出版，但因忙於他事，而當時環境亦似不容許實

記發表，故僅記片段，終未成篇。「誘姦案」一章，嘗爲南京某刊物編者索去，但終被檢未刊；後乃移載於上海其他刊物上。

前年上海新辦某刊物編者來索稿，時我適需購米，告貸無門，乃將舊稿補充改寫交去發表。茲重加修訂，輯成是書，交亢德兄設法出版，蓋所以謀柴米錢耳。

本書所記，全係事實，絕無虛構之處。僅若干人之姓名略有更改，蓋或因不便，或因遺忘也。但「誘姦案」中的兩位主角及被槍斃之工人張阿春，則係真實姓名。惟作者素不善記憶，故對於各個人物的口吻等點，未能寫得一模一樣，殊覺抱憾。

讀者如將本書作爲故事讀，當然亦無不可。惟若不忘其中所記，也有時代的背景，現實的面目，黨爭的外史，社會的縮影，而絕非祇憑想像的小說，則或許更有趣味也。

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序於上海

入獄記 目錄

前記

..... 一

一 北伐時代

..... 一

二 大學生活

..... 三

三 盲目暴動

..... 六

四 學潮

..... 七

五 失蹤

..... 一〇

六 被捕

..... 一二

七 出獄後

..... 一三

被捕經過

..... 一五

一 南京的環境

..... 一五

二 「電報！電報！」

..... 一六

三 押上囚車

..... 二〇

四 檢察室中

..... 二二

拘留生活

.....二五

一 踏進拘留所

二五

二 監室素描

二八

三 「特別聚餐」

三二

四 放封

三四

五 白蟻和臭蟲

三七

六 「第二家室」

三九

七 大雷雨

四〇

一件誘姦案

.....四七

一 監中情過

四七

二 當事者的自白

五〇

(一) 鍾情

五〇

(二) 夏夜

五六

(三) 波折

五八

(四) 逃避

六三

(五) 再合

六五

(六) 會審

六九

三 判決

七一

瑣事雜錄

七三

一 鴉片鬼的故事

七三

(一) 謀財害命

七三

(二) 烟癮發作

七五

(三) 伸冤被打

七八

二 啞吧和缺嘴

八〇

三 「辦公事」

八二

幾個政治犯

八五

一 工人張阿春

八五

(一) 情史

八五

(二) 鬥爭史

八七

二 叛變的兵士

九〇

三 知識份子

九二

(一) 自投羅網

九二

(二) 受刑以後

九四

四 反動的憲兵

九五

五 父子對認

九七

六 他們的結果

一〇〇

提審和接見

.....

一〇一

一 提堂對質

一〇一

二 破獲追記

一〇五

三 生死關口

一〇八

四 探監接見

一〇九

集團鎗斃

.....

一一五

一 不祥之兆

一一五

二 子夜風波

一一七

三 第二批鎗斃

一二〇

判決入獄

.....

一二五

一 血的五月節

一二五

二 「晦氣打散了」

一二七

三 押解入獄

一二九

前記

一 北伐時代

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年）的五四運動和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年）的五卅運動，都是由青年發動而以青年為主體的民族解放鬥爭的表現；而其結果，都與新文化有關，又與革命有關：五四展開了文化革命，五卅展開了革命文化；五四破壞了因襲的封建觀念，五卅播下了普遍的革命思想。

耽於理想而富於活力的青年，對於現實生活本易感覺不滿，而對於當前中國的國際地位和民衆處境，尤其感覺不平，常思有以改造。五四和五卅兩次運動，不過是中國的新青年從事於打破現狀活動的開步。自此以後，很多青年在接受着新思想，探討着新學說；反傳統的革命的意識，或隱或顯地在青年羣間流傳，而更有一部份青年因此參加了實際的革命工作。

我在年輕時便是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。五四時代，我還在鄉村小學裏讀書；五卅時代，我在松江蘇省立第三中學裏讀書。但影響於我的思想生活者，却並不是那種戲劇式的遊行宣傳，而是大部份

由家兄購來、一部份由圖書館借閱的新文化書籍雜誌。厭舊喜新和主持公理正義，本是一般兒童的天性，因此，反傳統的創作和言論，尤其使我感受到深刻的印象。

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開始，共產運動活躍一時。但到十六年奠都南京以後，就發生了寧漢分裂、除共清黨之役。當時松江第三中學已改組為松江中學，我便在那裏高中部讀書，任何黨派都沒有加入。但因見於貪污土劣乘機抬頭，不免大生反感；同時認為共產主義要比三民主義更前進，更徹底；而且他們之成為被彈壓的黨，也引起了我的同情。

其時校裏的活動份子，都在忙於黨的工作，於是推選我為學生會的主席。我協助一班左派份子，號召全校的同學，聲援因共黨嫌疑而被捕的教員。經過了一度遊行示威，和向縣政當局接洽的結果，被捕的是被釋放了。潛伏在校中的共產黨員，對於我這無黨的活動份子，就來進行拉攏了。

我差不多毫不猶豫地參加了他們的組織——CY，就是「共產主義青年團」。當時因為清黨的結果，該地CY的組織業已解體，就只恢復了CY的支部。這支部中，除書記一席外，還設有青年、婦女、農、工、商各部。我加入後就被推舉為青年部主任，幹着些外圍活動、找人談話、拉人入黨的工作。

暑假以後，我轉到省立上海中學求學。當時松江CY的支部書記曾徵詢我要不要加入上海方面的

組織，但我漠然謝絕了。因為我喜歡自由，不願受身外的束縛。我自覺是一個帶點浪漫情調的人道主義者，這與共產黨的主張和紀律是不大適合的。

這時，共產革命已因國共分裂而流產，有不少幹着實際工作的人物退出了戰線，潛伏在上海從事文化活動。郭沫若和成仿吾等把一向鼓吹浪漫主義的「創造社」染上了紅色，蔣光赤（即蔣光慈）和錢杏邨（即阿英）等組織了「太陽社」，他如潘漢年、潘梓年、華漢等，也在辦着刊物。首先是鼓吹「普羅文學」，跟着又提倡「唯物辯證法」和「新興社會科學」等，很能把握住一班青年的心理。我受了他們的影響，也曾寫了幾篇雜感和小說投到「幻洲」和「北新」半月刊等刊物上發表，但如當時流行的創作一樣，實質上却帶着自由主義、甚至象徵主義的色彩，嚴格說來，是不合於「普羅文學」的標準的。

二 大學生活

過了一年，我考入了南京中大肄業。我進的是法學院政治系，應該是預備做官的。可是我在課外所讀的，大部份却是新興的文藝和社會科學的書籍雜誌，我非但不與那些擔任要職的教授聯絡，有時甚至還要向他們抬槓，只有兩三位確有學識而具有憂時之念的教授和我相當接近。

進了大學以後，寫作和發表的機會更多了。經過一學期，便因投稿的關係，爲新移到南京出版的「中央日報」編了一種「文藝週刊」，在這上頭，除刊載一些純文藝的作品以外，也不時地鼓吹「革命文學」，說文學應該有時代性呵，應該表現大衆的疾苦、暴露現實的醜惡、指示將來的光明呵，應該積極地作爲剷除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的先鋒呵等等。這種籠統的理論並不與三民主義牴觸，同時在政當局也未會密切注意到文化政策，所以在客觀上並未遭遇困難。惟後因暑期返鄉，便告停刊。至秋季開學後，我又爲「新京日報」編了一個週刊，色彩更爲鮮明，爲上海方面的「普羅文學」運動打着「邊鼓」。

這時，共產黨爲便利公開的活動，竭力籠絡一班「同路人」，進行種種外圍的組織。「左翼作家聯盟」成立了，一向與「革命文學」派對立嘲罵的魯迅，成了該聯盟的臺柱。此外，還有「新興社會科學家協會」等團體。而最令人注意的是「爭取自由大同盟」的成立，其活動目標爲保障民權，爭取自由，這種口號，確能打動不滿於當時政府施策的人的心弦，而且發起人中如宋慶齡、蔡元培、楊杏佛、魯迅、郁達夫等，都是革命耆宿或文學名流，自然更易激動一班熱血的青年。不久，在校中也貼出了徵求會員的傳單，我不禁怦然心動，便在上面簽了一個常用的筆名。過了幾時，召開成立大會，討論尚未進行，先有人在散發「工人共濟會」的宣傳品，令人一讀內容，就知道其中至少是潛伏着共

黨份子。

開過會後，我認識了幾個新朋友，他們對我很表示好感。其中有一位姓郁的同學，會在我主編的週刊上登過稿件，因此和我更其談得攏。他和我談了幾次話後，就用了約我一同參加黨組織的方式，把我拉進了校中的支部。

我入黨以後，才知道在全校二千餘同學中，共產黨員只有四、五人。他們的活動力量很薄弱，而且大都有點浪漫頹廢，因此不能發生任何作用。支部書記是一位工學院的同學，姓黃，他個性孤僻，不善交際，而且頗為消極。郁是一個法學院經濟系的同學，兼事文學的研究，個性強烈，每每自作主張。其餘都很平庸，畏怯不前。以這樣的成份，工作自難展開。不過，既然身為黨員，大家對於黨就有點責任感。我們除繳納例定的黨費，供養窮得要命的「市委」外，還出資購置油印機件，印發宣傳品；除做外圍工作和吸收新黨員外，還利用我所主編的週刊公開鼓吹普羅革命——結果該刊接到在政當局的兩次警告後便告停刊了。這時，這個支部的工作才有了點生氣，甚至還成了南京區的「模範支部」。

老實說，我對於共產黨的工作並不感到興趣。但我不滿舊社會，我嫉視惡勢力，我尤其痛恨藉革命為幌子的新軍閥和新官僚的禍國殃民。而共產黨是一個在野反抗的黨，因此我就加入了。待入黨以

後，便覺得應當負起責任，故在平時相當積極。其後老黃因須準備畢業考試，切求擺脫書記的職務，結果我被推舉繼任。那時候，我們常在玄武湖中泛着一葉扁舟，或跋涉於山林野地之間，或圍坐於黑夜密室之內，壓低了語聲，召開着會議。有時我們還跑到陶知行主辦的「曉莊師範」去進行聯絡，甚至曾集合了全京「自由大同盟」的會員到馬路上去舉行了一次無結果的擴大宣傳。當民國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江西發動武裝暴動之前，南京的各支部書記，曾在一座偏僻的山壁旁邊，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，那個「市委」書記截釘斷鐵地宣告準備暴動，歡迎紅軍，奪取政權，組織蘇維埃。其實全京黨員只有數百人，連外圍羣衆恐怕不滿一萬，如此輕舉妄動，除犧牲黨員生命外，怎能成功呢？

三 盲目暴動

暑期又到了，我照例要返鄉省視老母。黨准許我請假，書記一職仍由老黃負責，因為他已畢業，可以專做黨的工作了。這時校中，除掉他和一個東北籍的同志外，其餘黨員都回家了。小資產階級本來只能做「同路人」的，他們入黨，不過是「客串」性質罷了，誰願受過份的束縛呢！

我在家裏，日以讀書閱報爲消遣。不久就傳出了紅軍攻入長沙等湘鄂贛各省要道的消息，各地舉行暴動的消息；接着又傳出了紅軍被擊潰退的消息，各地共黨被破獲的消息。首都共黨的大破獲，自

更哄動一時，報上赫然刊着留在中大的老黃和一位東北籍的同學、南京「自由大同盟」的負責人，以及其他許多黨員，都遭逮捕槍決了。

這次共產黨的盲目暴動，犧牲了不少的幹部，遭到了絕大的打擊，幾乎一蹶不振。從此以後，我也就安心讀書，不想再從事政治活動了。其後雖曾有一兩個校外的不速之客來找我談話，但我都表示冷淡。我想，中國有這麼多的貧民，可是同情於共產黨的却是這麼少，其故何在呢？這除了共產黨的政策有不妥處外，顯然也因為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的國情。近百年來，中國因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，使民族資本主義無高度發展的機會，國內的產業既未發達，產業工人——亦即是真正的無產階級——乃亦不多，這樣，共產運動先就缺乏客觀的基礎。其次，中國人的貧困，主要地是為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——買辦資產階級所賜，在這個前提下，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，是聯合全國力量以驅逐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，而不是實行階級鬥爭以成立基礎薄弱的蘇維埃政府。最後，中國人向受孔孟思想的薰陶，抱着中庸的態度，因此大都不願附和共產黨的暴力手段。在這樣的懷疑下，我便不想再加入共產黨了。

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的事變發生了，政府爲了「先安內而後攘外」，爲了信賴國際聯盟的「公道」，竟採取了「不抵抗」政策。這在國際上果造成了一大笑柄，在國內更激起了青年的悲憤。在這當兒，又有一個校外的不速之客來找我談話，他痛罵過去的「立三路線」（即李立三任中共書記時，過度誇張主觀的力量，進行盲目的暴動，而致遭受慘敗的政策），接着分析了這次事變，並提出了「反帝」的口號。其時我並不想入黨，但我想幫他一點忙，待校中支部成立後就告退出，於是我又以「客串」的心情，集合了新舊同志五、六人，重新負起了組織支部的任務。其後雖曾一度因「市委」負責人被捕而致工作中斷，但不久即有其他負責人來聯絡而告恢復。

當時國際形勢日趨緊張，而在政當局則堅持「剿共」政策，不惜對外退讓，以圖消除內憂。共產黨乃乘此機會，竭力宣傳國民黨喪權失地之罪，成立了「反帝大同盟」，以吸收外國的份子。青年的情緒本極熱烈，在當時的情景下是益發激昂了，因此我們的支部工作有了新的展開。我們從漸次擴大的「反帝大同盟」中吸收優秀的成份，一時黨員增加到一、二十人。

在朝黨派喪失羣衆的信賴，正是在野黨派把握羣衆的機會。其時校內支部書記已另由他人負責，我則專事公開的活動，擔任學生會的執行委員——不過，我的當選，完全是出於朋友的慫恿與私人的幫忙，與共產黨並無關係。到了召開全體學生緊急大會時，共產黨就有了爭取領導權的機會。每次由